

# “安全困境”的形成与缓解

——以冷战后东北亚安全为例

王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关键词]** 安全困境;形成因素;缓解;东北亚安全;周边外交

**[摘要]** 本文以安全困境的形成与缓解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指出了国家间安全困境形成的基本假设。接着,论证了导致国家间安全困境形成的因素,包括无政府性、人性恶、同处一个体系、某些国家故意引导、某国实力迅速增强、国家间有效沟通效率不高甚至失败、生存和安全利益冲突。以此为基础,本文指出安全困境缓解需要着重加强制度与机制建设、多层次沟通、塑造经济等共同利益、相互妥协、管理安全利益冲突等几个方面。紧接着,本文详细分析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形成原因,以及缓解的主要思路。在结论中,本文指出,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并非无解之局,在中国政府首次召开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和前所未有重视周边外交的背景下,如何从理论与战略高度看待、并务实缓解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理应成为事关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面向。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018-11

国家间的安全困境长期困扰着人类的生存与安全,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近年来在东北亚地区相关敏感问题上,屡屡出现有关各方均“自我挫败”和“多方共输”的情况<sup>①</sup>，“打破既有的安全困境,关乎相关各国共同利益,已成为东北

亚地区诸国的共同愿望”。<sup>[1]</sup>对中国而言,在周边次区域中,东北亚地区<sup>②</sup>不仅安全困境最为严重,而且该地区“对中国安全利益极其重要”。<sup>[2](P89)</sup>中国新一届政府前所未有地重视周边战略,在其他三个次区域相应提出了“一路一带”、“两个经济走廊”等

**[收稿日期]** 2014-08-08

**[作者简介]**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东北区安全研究。

① 比如在朝核问题上,朝鲜没有通过发展核武器获得相应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反而面临更加孤立的国际环境。中、美、俄等国始终没有实现朝鲜弃核的目标,朝鲜反而在拥核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中日领土争执上,美国很可能想利用钓鱼岛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无视日本国有化是挑起本次事端的真正原因。非但不与中国联手控制局势与解决问题,而是反复表态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纵容与鼓励了日本右翼力量。从结果来看,美国或许的确给中国制造了麻烦,牵制了中国力量,却使得中国民意对美负面印象进一步加深,中日钓鱼岛纠纷也愈演愈烈,看不到出口,地区局势更为恶化。

② 尽管从地理上看美国并不属于东北亚国家,但是美国无处不在的影响,特别是其深深介入该地区相关问题,以及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并在两国的驻军实际分享了两国的部分主权,因此本文在分析东北亚安全困境时也将美国涵盖在分析范围内。

具体推进政策。那么在东北亚地区应该如何务实地着手构建周边战略,成为我们亟需回答的问题。

长期以来,大量已有研究成果或者是指出东北亚安全困境产生的某一方面原因,或者泛泛列举几个原因,鲜有系统的对策建议。更有不少悲观主义者认为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根本没有出路<sup>①</sup>。背后原因仍然是缺乏对“安全困境”形成与缓解本身的深入理论分析。本文意在探讨:从国家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安全困境的形成?理论上缓解安全困境的指向是什么?如何有针对性地看待与缓解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

## 一、安全困境的特征及其缓解的传统分析

总体上看,几乎所有学者普遍认为“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国家间关系中最重大和广泛的特征”。<sup>[3](P29)</sup>关于“安全困境”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翰·赫茨提出,<sup>[4](P157)</sup>巴里·布赞和我国学者唐士平也都进行过较为严谨的界定和论述。<sup>[5](P285)[6](P594-595)</sup>

在概念阐释的基础上,很多学者指出了安全困境的两大特征。其一,根深蒂固性。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困境与国际体系如影相随,难以突破。罗伯特·吉尔平对此指出:“从根本讲,今天的国际政治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况并没有区别”。<sup>[7](P228)</sup>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安全困境不仅导致冲突不断,而且某些学者所理论推演的“大国无战争”逻辑始终没法得到验证与保证。<sup>[8]</sup>安全困境的这种根深蒂固性被巴特菲尔德描述为“现代国际冲突中的悲剧因素”。

其二,政策的自我挫败。一个国家如果感到

处于安全困境之中,他就会实施增加军力等行为,这可谓是理性的。可这种理性行为自然会被同样处于安全困境的其他国家视为威胁,然后也相应增加军力,从而导致彼此关系紧张、冲突,甚至战争连绵不断,各自的安全环境均进一步严峻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安全困境是用来解释为什么并不试图相互伤害的国家之间,甚至是利益目标一致的国家之间最终还是走向冲突。<sup>[9](P29)[10](P231)</sup>

关于如何解决安全困境,不同理论流派存有较大争议。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家间“安全困境”的根源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改变这种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就没有出路。而在国际社会建立世界政府是不可能的,因此“安全困境”的解决没有出路。进攻性现实主义甚至认为“只要国家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之中,就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安全困境”。<sup>[11](P49)</sup>自由主义学派同样认为安全困境不能根除,但却可以缓解。因为“国际制度和国家间相互交往,增进了理解,减少了国家间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sup>[12]</sup>而且,安全只是国家最大化利益中的一部分,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国家,可能只追求相对安全。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安全困境”是由行动者建构的,既然行动者之间能够建构安全困境,也就可以建构安全共同体。<sup>[13]</sup>

要想找出安全困境缓解的路径,首先需要找到安全困境形成的原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上述不同理论流派虽然在安全困境的缓解前景与路径上有不同观点,但在其形成原因上,不管是现实主义学派的悲观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学派的制度建设和建构主义学派的观念建构,都源于三个基本假设:人性自私、同处一个体系、无政府性。这里要追问的是,这三个基本假设正确吗?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参与形成了国家间安全困境?

① 参见:Robert Jervis,“Realism Neo-realism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42- 63; Jeffrey W. Taliaferro,“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 01, pp. 128- 161; John J.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1995, pp. 332- 337; 唐士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0-150页。

## 二、是什么导致了安全困境的形成?

从人性或心理学角度分析国际关系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不乏学者以此视角解读安全困境。巴特菲尔德就指出安全困境的产生根源是“人性恶”,认为是源自人性对财富和权力的欲望最终导致国家互相争夺资源。<sup>[14]</sup>托马斯·谢林则强调互不信任和沟通失败导致了国家间关系不确定性以及安全困境的形成。<sup>[3](P36-38)</sup>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决策者心理活动所致的知觉(Perception)与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安全困境的重要因素。<sup>[15][16](P60-89)</sup>

对于从结构视角分析安全困境的生成机理,更是蔚然成风。<sup>[16](P157)</sup>安全困境概念的最早界定者赫茨尽管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提出者出现在同一时代,但相比于后者主要从人性逻辑分析国际关系,赫茨还是第一次从结构视角分析国际关系,这也成为后来结构(新)现实主义形成的主要动力。<sup>[17](P3-4)[10](P48)</sup>结构分析的视角表明,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不管一个国家意图如何,只要实力进步就会客观增加安全困境。国际关系史的客观实践也表明,自近代以来“由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安全困境往往因大国崛起而加剧”。<sup>[18]</sup>

上述分析表明,“安全困境”的形成因素“人性自私、同处一个体系、无政府性”假设具有合理性。人性分析的视角表明,人性自私与对他人行为“最坏处着想”确实是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1996年美国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除非人性发生变化,否则实力与武力将永远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sup>[19](附录1)</sup>如果各行为体不处于同一个国际体系中,行为体本性再恶也不可能产生安全困境。而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各国安全自我依赖,

的确是造成国家间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从逻辑上讲,“同属一个体系”对于区域问题研究某种程度可以简化为同处一个地区,“人性自私”与对他人行为“最坏处着想”属于生物学上的本能反应,这两点可被视为不言自明的论证。对于“无政府体系”,尽管欧洲的例子表明地区一体化程度越高,安全困境确实有所减弱,但对于一体化进程相近、无政府性处于相似程度的地区,为什么有的安全困境严重,有的安全困境相对较弱?无政府性程度最低可用一国政府进行类比,为什么有的国家内战不断,而有的就很稳定?就此可见,无政府性是安全困境产生的根本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还有其他因素参与了安全困境的形成。

结合上述分析,至少有三个因素还需提及。其一,某一国家实力的迅速增强引起结构变化,“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更关注其他国家的实力而非意图”。<sup>[20](P74)</sup>其二,有的国家为了国内目的故意制造策划外部的安全困境,这在学理上称为“国家引导性安全困境”<sup>①</sup>。精心策划的安全困境表明某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引导也是安全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其三,心理学角度的分析还表明,有效沟通效率不高、甚至失败也是安全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约翰·赫兹为此感叹道,“正是由于对自己邻居意图的不确定性及由此产生的焦虑才使人类处于困境之中”。<sup>[4](P3)</sup>如果继续追问,为什么有的地区无政府性程度高,有的低呢?为什么一国实力迅速增强就会引起其他国家不安呢?为什么有的大国会精心策划引导其他国家进入安全困境呢?这还要分析各国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博弈与考量。

很多学者强调过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汉斯·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主权国家所构成,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sup>[21](P41)</sup>李少军教授指出,“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驱动国家互动的最基本

① 关于国家引导性安全困境的论述参见:Jack L. Snyder, “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1914”, in 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Janice Gross Stein (eds.),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3.

要素”。<sup>[22]</sup>王逸舟教授也指出,“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构成了国家间互动的一个最重要因素”。<sup>[22]</sup>中外政治家们对此也普遍认同。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 1848 年 3 月 1 日在英国下议院的发言常被视为对国家利益的最经典表述:“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追求那些利益是我们的职责”。<sup>[23](P313)</sup> 1989 年底邓小平于中美关系紧张时,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sup>[24](P330)</sup>

由此不难看出,国家间外交的最大动因与最根本影响因素在于国家利益。作为国家间关系重要特征的安全困境,是不同国家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其中,不同国家的利益冲突部分,特别是结构性冲突部分,是国家间安全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所谓结构性冲突常常表现为国家利益中最关键部分的冲突。“就生存利益而言,几乎所有学者都把它放在国家利益首位,认为它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sup>[25]</sup>“在很大程度上,安全关系决定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文化关系的性质和特征。而安全关系归根结底是安全利益关系”。<sup>[26]</sup>阎学通教授更为直接地指出,“我国国家利益的排序是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sup>[27]</sup>对生存和安全利益作为国家利益首要考虑的强调也能从中国官方的论述中看出来,比如邓小平提出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sup>[24](P348)</sup>

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也认为生存与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核心构成。罗伯特·基欧汉指出,“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危机时刻,安全在对外政策中仍然高于其他问题”,“武力和安全仍是首要问题”。<sup>[28](P84)</sup>

至此,如图 1 所示,国家间安全困境归根结底是在人性自私、同处一个体系、无政府性等七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 三、安全困境的缓解与超越

由安全困境的形成因素可以发现,尽管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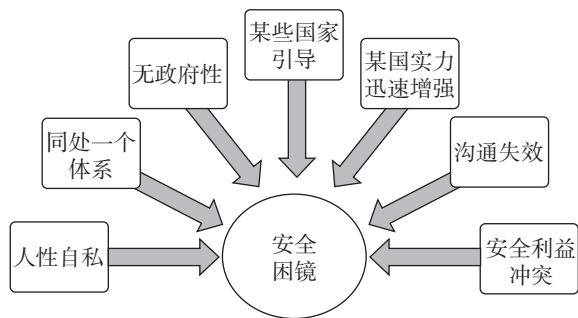


图 1 安全困境的形成

困境根深蒂固难以根本消除,但仍可以进行相应缓解。一方面,某国实力的迅速增强、某国的故意引导、有效沟通效率不高甚至失败,与一国的政策选择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对于国家利益的冲突,“由于国家利益的界定都是由国家自己做出的,都是以对自己有好处为标准,因此无论大国小国,都有一些共同点可寻”。<sup>[22]</sup>而且,由于全球化与相互依赖,“今天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相关性不断增加,他国利益、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往往与本国国家利益的发展方向一致,甚至有时成为本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sup>[29]</sup>况且,在追求和实现的过程中,国家利益的自私性往往促使我们“努力以最小的代价解决冲突,从而产生对于各方都有利的共同利益”。<sup>[30](P109)</sup>

即使对于无政府性,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也表明国际社会在演化与进步,这包括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相互依赖、因核武器造成的“恐怖依赖”致使各国间安全合作增强、合作而非零和观念的建构等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仅无政府程度在降低,而且正如新自由主义指出的那样,“武力解决国家间利益冲突的代价越来越高,合作能给彼此带来更多好处,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国家必然更倾向于合作。高度相互依赖也增大了不合作成本”。<sup>[31](P198)</sup>

关于如何缓解安全困境,目前很多学者主张通过引进进程性因素,如国际安全合作的加强等,即通过合作性而非竞争性的战略。<sup>[32]</sup>在这方面,主张通过建立“安全机制”和建构“安全共同体”实现集体安全的呼声最高。<sup>[33][34]</sup>安全困境的传统应对战略往往是寻求均势、建立霸权或军事结盟,应

该说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教训使集体安全思想成为全球范围内寻求安全的路径。建设安全机制与安全共同体的构想根本上回应了如何减少国际社会无政府性的问题。

“人性自私论”是政治社会学的最根本前提，自私本身属中性概念。如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本能一样趋利避害的同时能照顾到他人利益，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前提下，若能照顾到地区与其他国家利益，这种“自私”可被视为“善”的自私。如果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的过程中，故意损害别国利益，甚至为了“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搞乱”，这应被视为“恶”的自私。显然，“恶”的自私更能引起国家间安全困境。“恶”的自私行为如果是国家的故意引导，其逻辑等同于国家引导性安全困境。如果是国家的错误对外政策所引起，这又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对外部信息的错误理解。前者需要把重点放到国家引导性安全困境的缓解上，后者需要把重点放到解决国家间的沟通失效上。

对于国家引导性安全困境，很多学者指出了相互妥协的重要性：“国家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双方都不增强国防力量，这样对大家都好”。<sup>[35](P23)</sup>不增强国防力量对于“霸权”和“领导”的护持者与追求者来说都不现实。但相互妥协的主要意义在于要求各国应追求非常克制的对外政策。“规避这一（安全困境）恶性循环的愿望要求一种非常自我克制和稳健的安全政策”。<sup>[36]</sup>特别对于崛起国而言，由于其往往站在发展势头较为有利的一方，要力避战略焦躁或骄傲自大，明确自身权利界限，这一过程中的“战略忍耐”是一种美德。这就要求把对外目标限定在一个有限理性范围内，不要“大跃进”的急剧提高战略目标。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各国都不得不迅速增强军力的恶性循环。

对于沟通失效，一方面应重视制度平台建设。安全困境在利益考量上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双方利益的极大对立，在很多时候是零和收益（Zero-sum），但更多情况是因为双方信息不对称，均无法明确对方行为方式和无法预测对方意图。制度平台建设显然有利于两国政策积极协

调。另一方面要注重多层面交流，确保消息沟通的客观准确。这包括国家元首层面、其他国家领导人层面、部长级层面、工作事务层面、派出使馆层面等。还要特别重视民间与智库层面的第二轨道对话。

关于同处一个体系，既容易导致利益冲突，也可以催生利益共同体。如果各国安全利益属非冲突性利益，非安全领域的利益高度互补，就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否则，就会加剧利益冲突。就此可见，对同处一个体系因素的缓解还要放到解决安全利益冲突与打造非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上。

关于后者，国内有学者指出，“共同利益的汇聚及其制度化、所涉各国共担责任、大国承担主要责任已成为国际合作的基本战略路径”。<sup>[37]</sup>这也理应成为缓解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基本战略路径。以共同利益作为切入点，至少可实现三个方面目标：第一，各方都可以迅速实现收益。第二，提升信任建设与培养合作的习惯。第三，经常会面使得沟通畅通成为可能，届时尽管该地区结构性的安全问题没有解决，但相关方之间的对话仍能维持，这就为累积信任、最终解决包括结构性安全问题在内的相关问题打下基础。

针对某国实力迅速增强所引起的安全困境，除了持续向外释放清晰信号外，归根结底要通过利益互惠逐步降低和打消其他国家的疑虑。至此，以安全困境的形成因素进行针对性的缓解，理论上安全困境的缓解路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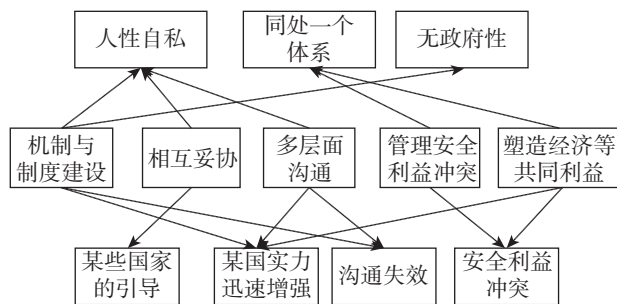


图2 安全困境的缓解路径

由图2可见，机制建设有利于缓解人性自私、无政府性、某国实力迅速增强、沟通失效等四个方面；多层沟通有利于缓解人性自私、某国实力迅

速增强、沟通失效等三个方面;塑造经济等共同利益有利于缓解同处一个体系、某国实力迅速增强、安全利益冲突等三个方面;相互妥协可以缓解人性自私和某些国家的引导;管理安全利益冲突可以缓解同处一个体系和安全利益冲突。

对比可见,机制建设除了同样能缓解多层次沟通所能缓解的三个因素外,还能缓解无政府性。塑造经济等共同利益除了同样能缓解管理安全利益冲突所能缓解的两个因素外,还能缓解某国实力的迅速增强。大致可以认为,如果以每种路径所能缓解的安全困境形成因素数量的多少作为路径有效性评估的指标,把安全困境的七个形成因素各赋值1分,那么机制建设所能缓解的分值为4分,多层次沟通和塑造经济等共同利益所能缓解的分值各为3分,而相互妥协和管理安全利益冲突分别为2分。

#### 四、东北亚安全困境的形成与缓解

东北亚相关各国均高度强调安全诉求,该地区安全困境也远远大于其他地区。究其原因在于上述安全困境的形成因素在东北亚地区尤其明显。这首先表现为该地区中美日俄大国林立,而且亚太地区的几大热点问题——朝鲜半岛、钓鱼岛、两岸关系问题等,都处于这一地区。使得各国安全利益不仅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深刻影响到国际格局的变化走向。该地区大国小国对彼此的安全动向均高度关注并极为敏感。

其次,该地区的无政府状态远较其他地区突出,并与安全困境形成恶性循环,互为制约。“东北亚极低的一体化,才是整个东亚地区一体化和东亚经济圈整体竞争力的根本制约瓶颈,而东北亚一体化的制约瓶颈又根本在于安全困境问题”。<sup>[38]</sup>对于该地区多边机制建设,“东北亚国家力量格局和安全体系没有进一步改变的情况下,权力结构能够给该地区提供的多边安全合作空间十分有限,制度主导的自由主义仍然无法说明制度化程度很低的东北亚如何才能建立起安全制度对权力的有效制约”?<sup>[39]</sup>笔者也曾论证过目前在东北亚地区实际上并不存在多边安全机制建立的

条件。<sup>[40]</sup>

再次,该地区部分国家间有效沟通效率不高甚至严重缺失。美日韩与朝鲜仍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双方无论是政治外交对话还是民间对话都极为缺乏,更不用说沟通的高效与准确。这不仅导致美日韩的对朝政策常常处于无效状态,也致使朝鲜屡屡错判外部形势,对外政策曾出现重大失误。尽管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指出的“中日之间的问题有七成是基于误解和理解不足”<sup>[41]</sup>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中日间受制于历史与领土争端,明显存在严重的对话缺失问题。日韩虽然同属美国盟友,但由于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两国高层对话动辄就出现停滞。近期,中日、韩日的高层交流由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屡屡发表错误言论和其国内右倾做法,已几乎完全中断。中国外交部明确表态,由于安倍一意孤行、不思悔改,中国领导人与其对话的大门已经关闭。<sup>[42]</sup>中韩则由于美国因素和朝鲜因素,两国对彼此“战略对手”的错误意向也时常出现,严重制约了对彼此意图的准确把握。

另外,对于有关国家引导的安全困境,一方面美国霸权是该地区诸多安全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sup>[43]</sup>近年来,为了所谓的“担心中国挑战现状”、遏制中国崛起,并继续主导东北亚事务,美国强化了同日、韩的军事同盟,美日韩三边军事机制也得到实质性进展。为此,美国推动和利用朝鲜半岛和钓鱼岛问题的适度紧张。另一方面,日本安倍政府为了国内修宪扩军,不断通过“中国威胁论”、钓鱼岛、历史等问题刺激周边有关国家,旨在利用外部安全局势的紧张服务于国内政治目标。<sup>[44]</sup>

再者,该地区诸多安全困境与中国崛起越来越显示出部分程度的强关联性。尽管中国外交决策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具有可预期性,但源于实力增长带来的安全困境不仅没有得到自然舒缓,反而有所增强。中美在遏制与反遏制的矛盾上进一步加剧。日本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接连挑起事端,两国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低谷,仍然看不到出路。韩国所谓的“要利用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管理中国崛起”的声音在韩国战略界也颇有市场。中国本身

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与国家实力的迅速增强而感到更加安全,反而周边矛盾出现频发期,根源就在于其他国家并非仅仅从中国的意图上判断中国走向,而更多是对中国实力增长表现出的不适应。

最后,该地区存在广泛的战略与安全利益冲突。区域内各大国战略利益存在较大冲突,“中美日俄四国间战略利益的结构矛盾决定了它们在各自安全战略定位与选择上构成潜在冲突”。<sup>[45]</sup>美国的所谓“管理中国崛起”实为遏制中国,这与中国存在强烈战略分歧。美俄在争夺该地区影响力上存在竞争。中国不仅与日本存在地区领导权之争,两国还存在历史与领土争端。日本与俄罗斯也存在领土争端。其他中小国家中,韩朝之间存在激烈敌对关系,双方与日本还存在领土与历史争端;朝鲜和美国存在冷战对峙。

从东北亚安全困境的缓解上来看,各国过去所采取的路径主要是塑造经济共同利益、相互妥协以及管理安全利益冲突。有很多学者讨论过该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sup>[46][47]</sup>也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报告中的关键词分析,论证过中国对塑造共同利益的重视。<sup>[1]</sup>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亲、诚、惠、容”、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反映出新一代领导人主动塑造共同利益的政治诉求。

相互妥协突出的表现在对美关系上。楚树龙教授指出,“中国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不再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和目标,它意味着中国不再挑战、不再反对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领导’或主导地位”。<sup>[48]</sup>中国反复表明在包括东北亚地区在内的广泛的亚太地区并没有挑战美国主导地位意图。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2012年在中国访问时对此表示:“我在这里,在跟中国领导人的交谈中听到了令我非常愉快的消息,那就是——他们承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并非对他们的威胁。他们把这看作是对太平洋地区未来繁荣与安全有重要作用的事件”。<sup>[49](P22)</sup>

作为回应,美国在反对台湾独立问题上曾和中国进行了有效的共同管理。<sup>[50](P39-78)</sup>管理安全

利益冲突更突出表现在该地区相关国家对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局势可能失控的多边管理上。<sup>[51]</sup>

该地区在缓解安全困境上的主要落后指标在于机制制度建设和多层次沟通上。这如果与中国周边的其他次区域对比,就更为明显。就多边机制建设而言,东南亚国家早在1961年就成立了东南亚联盟;南亚有关国家1985年举行首届首脑会议,宣布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正式成立;中亚于1996年4月成立“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年6月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东盟不仅致力于该地区经济一体化,也致力于安全一体化,并于1994年召开首届东盟地区论坛(ARF)。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目标在于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主要致力于农业、乡村发展、电讯、气象、科技与体育、邮政、交通、卫生与人口、文化与艺术等9个领域的合作,迄今取得的最大合作成果是“南亚特惠贸易安排(SAPTA)协定”的签署和实施。就多边机制建设缓解安全困境而言,东南亚显然领先于中亚,中亚领先于南亚。

在多层次沟通上,东南亚、南亚、中亚三个次区域内的国家均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中亚地区目前已建立起包括国家元首、总理、总检察长、安全会议秘书、外交部长等会晤机制。东南亚国家不仅建立起成熟的首脑会议、外长会议、常务委员会、秘书处、专门委员会以及民间和半官方机构,还建立起经济部长会议以及其他部长会议,并定期举办东南亚运动会和东南亚足球锦标赛。南亚地区有成员国首脑会议、由各国外长组成的部长理事会、由各国外交秘书组成的常务委员会等。就多层次沟通而言,东南亚领先于中亚,中亚领先于南亚。

此外,在塑造经济等共同利益上,东南亚地区已实现高度一体化,其他三个地区则次之。如果假设四个次区域在相互妥协和管理安全利益冲突方面为大体一致程度的话,表1可见,以缓解安全困境的路径作为赋值指标再次表明,在中国周边次区域中,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要远远大于其他三个地区。

表1 中国周边次区域安全困境缓解对比

	多边机制建设	多层次沟通	塑造经济共同利益	相互妥协	管理安全利益冲突	总计
东北亚	0	0.5	2	2	2	6.5
东南亚	4	3	3	2	2	14
南亚	2	1	2	2	2	9
中亚	3	2	2	2	2	11

因此,东北亚安全困境缓解的主要着力点应该“弥补不足、巩固成绩”。所谓弥补不足,就是要有意识地加强多边机制建设和多层次沟通构建。上述赋值表明,这两个指标对于缓解地区安全困境最为有效。因此,尽管该地区暂时不具备多边安全机制建立的条件,已有的相关多边对话仍需积极推动。除了在东亚峰会等机制中该地区各国应积极参与外,该地区为解决朝核问题建立的六方会谈也应积极重启。该地区安全困境与一体化所造成的恶性循环,使得中日、日朝、朝韩、美朝等本就有限的高层对话机制越来越少。重启六方会谈不仅可以就朝核问题进行谈判,而且也可以为这些本就缺乏双边对话的国家之间搭起沟通与协调平台。

在应对该地区广泛的沟通失效上,除重启六方会谈外,尤其应扩大该地区的多层次交流。这在中日围绕钓鱼岛、东海防空识别区等问题展开激烈对峙的情况下,维持两国包括智库对话在内的多层次交往对于防止局势失控有重大意义。在朝鲜与美日韩高层对话几乎中断、与中国迄今没有实现首脑会晤的情况下,维护中朝已有的高层对话与交流,并积极推动美日韩与朝鲜的多层次对话,也对缓解该地区的安全困境有益。

与此同时,要巩固已有成绩,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进一步巩固与加强在塑造经济共同利益、相互妥协、管理安全利益冲突上的已有努力。关于该地区的共同利益,有学者指出,“东北亚共同利益天然存在,但却长期被国内外学者忽视,从而无法深入挖掘东北亚合作的根本动力”。<sup>[1]</sup>并将该地区的利益汇合点总结为四个方面:无核化与半岛和平、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地区开发与经济发展、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sup>[1]</sup>外交部长王毅2014年元旦

就该地区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间的关系也明确指出,“积极寻求共同利益是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源泉,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任何情况下,双方都不能忘了这一基本事实”。<sup>[52]</sup>应该说,目前东北亚各国对该地区共同利益的挖掘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不够。

相互妥协的主要目标是让美国做出战略让步。对于美国霸权造成的安全困境,让美国主动放弃目前在东北亚的有关战略安排并不现实。中国下一步应持续优化战略谋划,继续主动营造战略机遇期,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并特别重视加强硬实力建设,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作为现实主义主导国家战略的美国,只有促使其维持东北亚主导地位所需的能力远远大于其国力投放时,才会认真考虑与中国实行“护持战略”。从国际关系史的演进来看,实力原则仍是崛起国与霸权国生存的根本方式与互动的主要筹码,不同的是,在今天要摆脱历史上通过战争手段处理彼此关系的模式。因此,中国应以积极心态依托战略优化与实力提升与美国实现相互战略妥协,共同携手应对该地区相关事务。历史经验表明,在东北亚地区,当大国协调比较好时,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能得到进一步促进,降低安全困境。反之亦然。<sup>[53]</sup>

中国还需做两方面工作:其一,积极推动并深化中美两军交流塑造安全互信,大力推动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其二,加强与日韩的关系,降低日韩以“不安全”为由拉美国制衡中国的意图。在条件成熟时应继续推动中日韩三边机制建设,逐渐促使美国“改变以同盟保稳定、以对朝敌对保同盟从而使美国和本地区都陷入安全困境的战略思路”。<sup>[54]</sup>



管理该地区普遍关注的利益冲突,这尤其体现在管理朝鲜半岛问题上。当前,各国的合作围绕尽早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同时满足朝鲜的合理关切展开。应该说,朝核问题之所以解决起来如此困难,恰恰在于它不仅是美朝和解问题,更涉及东北亚大的战略格局重组问题。过去几年表明,朝鲜半岛无核化迟迟得不到解决和半岛局势紧张,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是输家。美国虽然在防止核武扩散问题上失了分,但是可以借此问题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和控制日韩两个盟友。濒临朝鲜半岛的中国东部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人口中心,事关中国周边核心利益。在中国实力和影响力增加以及前所未有重视周边外交的背景下,中国应该更为主动地去解决周边的这一“定时炸弹”。况且,中美关系是全局性的,美国在事关其核心利益的其他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配合。

## 五、结 语

长期以来,不少国际战略家认为国家间安全困境属于无解之局,国际关系理论对此也有专门论述。由于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异常复杂,认为该地区安全困境没有出路的文章更不在少数。本文分析表明,“悲观主义者”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安全困境的形成根源没有深入分析。对此,本文首先从国际关系学界对安全困境的已有分析上指出有关其形成的三个基本假设“无政府性、人性恶、同处一个体系”。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的视角指出某些国家的故意引导、某国实力迅速增强、国家间有效沟通效率不高甚至失败、生存和安全利益冲突也是安全困境形成的重要因素。以此为基础,指出了安全困境缓解所需着重加强的几个方面,这包括制度机制建设、多层面沟通、塑造经济等共同利益、相互妥协、管理安全利益冲突等。

以此分析东北亚地区,能很明显看出来该地区安全困境之所以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恰恰在于上述安全困境的形成因素在该地区表现尤其明显。这包括该地区大国集中与敏感问题林立、无政府程度非常高、受制于历史政治安全等因素国家间有效沟通严重匮乏、美日等国利用地区紧张

服务于其广泛的国内外战略等、中国崛起造成外部某些国家不适应、国家间的战略与安全利益存在较大冲突等几个方面。如果以安全困境的缓解路径作为评估指标、与中国周边的其他次区域对比,更能明显地看出东北亚安全困境的严重性以及问题所在。要缓解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就应该有针对性入手。

正如王逸舟教授指出的那样,“与文、史、哲等学科不大一样,国际关系研究绝少有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情形,国际政治理论经常要着眼于实践的需要”。<sup>[55]</sup>从实践来看,东北亚地区事关中国核心安全利益,局势极为敏感,如果该地区长期存在安全困境甚至是一触即发的安全危机,那么会持续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如何从理论与战略高度看待并务实缓解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理应成为事关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面向。

## 参考文献:

- [1] 门洪华 甄文东. 共同利益与东北亚合作[J]. 外交评论, 2013, (3).
- [2] 安德鲁·内森, 罗伯特·罗斯, 长城与空城计[M]. 柯雄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 [3] Nicholas Wheeler and Ken Booth. The Security Dilemma [A]. in John Baylis and N. S. Rengger (eds.), 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 [4] John H.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 [5] 巴里·布赞. 人、国家与恐惧: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M]. 闫健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 [6] Tang Shipi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J].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3, 2009.
- [7]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8] 杨原.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J]. 当代亚太, 2011, (6).
- [9]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

- lations[M]. London: Collins, 1951.
- [10] John H.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11] 约翰·米尔斯海默. 国际政治的悲剧[M]. 唐小松, 王义桅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12] 王子昌. 不确定性与安全困境[J]. 东南亚研究, 2002(6).
- [13] 袁正清. 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 建构主义的分析[J]. 欧洲研究, 2003, (4).
- [14] 郭锐, 孙衍彬. “安全困境”视角下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J]. 社会主义研究, 2013, (1).
- [15] Robert Je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J]. World Politics, Vo. 1 30, No. 2, January 1978.
- [16] 罗伯特·杰维斯.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 秦亚青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 [17] 肯尼思·沃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 胡少华译.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 [18] 叶江. 试析大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 (2).
- [19] 理查德·N·哈斯. 新干涉主义[M]. 殷雄, 徐静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
- [20] Joshua S. 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xth Edition)[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影印版).
- [21] 张历历. 现代国际关系学[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22] 李少军. 论国家利益[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1).
- [23] Jay M. Shafritz. The 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M].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 [24] 邓小平文选[M].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25] 邢悦. 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5).
- [26] 潘忠岐. 国家利益的主体性与中美安全关系[J]. 现代国际关系, 2003, (11).
- [27] 阎学通. 安全利益是中国首要利益[N]. 环球时报, 2008-04-13.
- [28] 罗伯特·基欧汉. 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M]. 门洪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9] 俞新天. 妥善处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J]. 国际观察, 2005, (3).
- [30] 雷蒙·阿隆. 寻求外交事务哲学[A]. 载[美] 斯坦利·霍夫曼著.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C]. 林伟成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31]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32] 门洪华. “安全困境”与国家安全观念的创新[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3).
- [33] 封永平. 大国崛起的安全困境与中日关系[J]. 现代国际关系, 2005, (12).
- [34] 王公龙. 多边主义与东亚的安全困境[J]. 当代亚太, 2002, (10).
- [35] 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M]. 张小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36]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A]. in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 [37] 门洪华. 中国东亚战略的展开[J]. 当代亚太, 2009, (1).
- [38] 冯昆. 东北亚区域安全: 困境、价值与前瞻[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2).
- [39] 张东宁. 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 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安全路径分析[J]. 东北亚论坛, 2010, (2).
- [40] 王俊生. 东北亚多边机制: 进展与出路[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12).
- [41] 冯昭奎. 复交40年: 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J]. 日本学刊, 2012, (5).
- [42] 2013年12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主持例行记者会[EB/OL]. 中国外交部网站, 2013-12-30.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t1113124.shtml](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t1113124.shtml).
- [43] 黄凤志. 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多维透视[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3).
- [44] 朱昕昌. 中国地缘安全环境中的“安全困境”问题解析[J]. 国际展望, 2012, (3).

- [45] 黄凤志,吕平. 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安全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1,(6).
- [46] 富景筠. 从区域内贸易视角透视东北亚经济合作机制[J]. 东北亚论坛,2011,(4).
- [47] 钟飞腾. 政经合一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J]. 南亚研究,2010,(3).
- [48] 楚树龙,应琛. 中美长期关系的两根支柱[J]. 现代国际关系,2013,(3).
- [49] Secretary Panetta. Ambassador Locke at Round Table in China[R].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20,2012.
- [50] Quansheng Zhao. Moving toward a Co-management Approach: China'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and Taiwan[J]. Asian Perspective, Vol. 30, No. 1, April 2006.
- [51] 王俊生. 朝核问题与中国角色:多元背景下的共同管理.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 [52] 王毅. 继往开来,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EB/OL]. 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01-01.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13705.shtml](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13705.shtml)
- [53] 王俊生. 中美双领导体制与东北亚安全:结构失衡与秩序重建[J]. 国际政治研究,2013,(4).
- [54] 韩献栋. 结构、行为、朝核危机和东北亚安全[J]. 现代国际关系,2007,(1).
- [55] 王逸舟. 国家利益再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2002,(2).

[责任编辑 刘蔚然]